

文章编号: 1006—5342(2004)02—0001—05

论“干校文化”^{*}

陈 辽

(江苏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 对“干校文化”兴起的由来、内容作了历史的回顾与理论的阐述, 重点分析了干校学员五种文化心态, 最后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了“五七干校”何以能存的原因, 较系统地回答了“干校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

关键词: 干校文化; 文化心态; 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湖北省有个咸宁, 那里有个云梦泽(现为向阳湖)。1969年, 文化部系统和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600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干校(后来江西“五七”干校比它更大)。“文革”后, 咸宁“五七”干校出了名, 因为咸宁又出了个李城外其人。他把咸宁“五七”干校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 访问当时下放到这里的知名人士; 约请曾经在干校生活过的人撰写文章; 编辑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 撰写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 主编了《向阳湖文化报》; 于是, 咸宁干校旧址被列入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文化中又列入了“干校文化”这个名目。但是, 什么是干校文化, 它的内容包含了什么? 在干校的学员中有哪些文化心态? 通过干校文化和干校学员中的文化心态, 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却远不是进过“五七”干校的人都已经认知清楚的。因此对“干校文化”有必要一论。

一、什么是干校文化, 它的内容包含了什么?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 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提出了下述意见: 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凡有条件的, 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本专业、学政治、学文化, 都要批判资产阶级, 都要办成“一个这样的大学校”。这些意见, 是就某一报告发表的原则性的感言, 并不是真的要军队、工人、农民、学生、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去办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大学校。不料, 林彪一伙就此大作文章, 说成是“光辉的‘五七’指示”,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高峰,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 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把一封普通的信, 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及至后来出现了“四人帮”, 林彪与之既矛盾又勾结, 他们于1968年起全面落实所谓“五七指示”, 从此, 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 办“五七干校”成风, 以致地区、市、县也办起了“五七干校”。当时, 我国的各级干部约一千万人, 进“五七干校”的少说也在五百万人以上。这五百多万人集中在“五七干校”, 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先知先觉的人们称之为“干校文化”。这就是“干校文化”的由来。

“干校文化”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林彪、“四人帮”办“五七干校”, 首先是把干部、知识分子作为不可信任、不可依靠的整体来惩罚的。所以, 进了干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都得要过劳动关。无分老少, 无分弱、残、疾病, 都得参加艰苦的劳动。干打垒盖房子的, 养猪的, 放羊的, 放鸭子的, 搞运输的, 开荒的, 种菜的, 栽秧的, 种麦子的, 养蚕的(这已经算轻劳动)……都得叫干部和知识分子干。而且不是小干, 而是大干, 没命的干, 一天劳动下来, 累得连上床前洗个脚都顾不上只想睡觉了。但如果光是劳动, 干部和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锻炼, 也还

* 收稿日期: 2004—03—04

作者简介: 陈辽(1931—), 男, 江苏海门人, 中共党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陈辽文学评论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等三十余部专著。

是可以勉强适应的。然而,林彪、“四人帮”办“五七干校”的目的,主要是搞“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派”,斗争“八种人”和臭老九;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否定一切,而后建立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即所谓“改”。于是,进入“五七干校”的人,不只是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斗、批、改”,甚至在田间、地头开斗争会。被斗的人固然被斗得筋疲力尽,神经错乱,就是斗别人的革命群众也不胜其负担。只有极少数“造反派”领导人和军宣队领导人才得其所哉地琢磨一切,策划一切,算计一切,有的是时间,享受的是战斗后的休息。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林彪、“四人帮”又大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搞逼供信,把人斗得昏天黑地。这是各个干校都在劫难逃的。天天出操、跑步,搞军训;背语录;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搞一套所谓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有人说,“五七干校”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炼狱”,是“文革”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点也不夸大。

但是,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同样适用于“干校文化”。即在“干校文化”中既有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反人性的文化,也有对抗这种文化的自觉的、正气的、呼唤民主的文化,要求早日结束干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即使受到痛苦的磨难,意志更坚定,理想更明确,思想更成熟,人格更高尚。干校文化中的后一种文化,随着林彪的叛逃、摔死,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而加快发展。没多久,林彪事件公布后,各种“五七干校”也终于宣告结束其历史性的闹剧而纷纷停办。干校文化乃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自然,干校文化中的两种文化,绝非那么单一,其中还包含着一些过渡性的形态,这和干校学员中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关。

二、具体分析干校学员中不同的文化心态

“五七”干校中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对干校学员命运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视干校为自己发迹上升的基地,因此把干校说成是好得不得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江苏“五七”干校里有个军宣队的领导人,原是营级参谋。到干校后领导“斗批改”,狠抓“五一六”,立了大功。干校结束后论功行赏,竟升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回到部队提升为师级干部。像这样的人,他会说干校不好吗?“五七”干校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心态。

在干校深受其迫害的一部分觉悟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则可以萧乾、张光年、洁泯、张惠卿、阎纲等同志为代表。萧乾说:办“五七”干校的用意在于:“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张光年说,咸宁干校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成堆’,那还得了?那当然是可怕、可恨、可鄙而又可怜的了。”洁泯在《咸宁干校记什》一文中,“全面地反映了干校的严酷生活,下湖劳动的苦况,人如蝼蚁一般地死去,有些管教人员横暴和道德败坏。”(参见戴文葆《怅望向阳湖》一文)阎纲说:“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陈原说:“一口气读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它仿佛让我重游了一次‘炼狱’,它带领我回到那十年——知识分子乃至各阶层的人民受难的那十年。”(陈原:《读〈牛棚日记〉》)这是在干校中受到整治后觉悟较快的一部分同志的文化心态。实事求是地说,有这样心态的人在干校中也是少数。

大多数在“五七”干校的学员则处于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的文化心态:

其一,以为到干校,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这可以郭小川去“五七”干校后写的诗篇《赠友人》为例证:“此刻啊,/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能够,/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然而,即使像郭小川如此虔诚地愿意在干校里劳动、改造,却因在《长江边上‘五七’路》一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剧烈跳动的中心——这整个肌体中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中心——北京街头。”也被诬为“怀旧”,当作“不安心改造,幻想着回北京”的“黑线回潮”思想而遭受批判(见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一文)。

其二,是把干校当作避风港的文化心态。这可以谢永旺为代表。他说:“因为难以预测极‘左’路线何时结束,便打算日后在咸宁找一份适合自己干的工作,或以教书为主。”有这样文化心态的人数颇多。谢永旺分析说:“走‘五七’道路,有的服贴,有的反抗,有的真诚,有的应付。我看当时大多数人是服贴改造的,这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至少是观察思考能力的退化。”(《“咸宁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访原〈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存有这部分心态的同志自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觉悟,对干校的评价有了很大改变。

其三,在干校心静如水,既不激动,也不悲观,极目蓝天白云,对视绿水青山,冷眼观察文革的发展,这可以冰心为代表。在咸宁“五七”干校里,以冰心的年事为最高,1970年刚过,她已是古稀之年,但她竟然也被下放到干校,与张光年、张天翼等

人一起,轮流看守菜地。她自己讲述了去干校途中的情形:“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的逗笑了。”寥寥九十多字就写出了未到干校之前冰心等人所受到的折磨。到了干校,冰心始终采取静观人世的态度。持这种文化心态的也不在少数(参见《一片冰心在向阳——拜望“文坛祖母”谢冰心》和冰心《和郭小川一起到咸宁》两文)。

其四,“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持这一文化心态的可以周巍峙为代表。周巍峙是著名的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的作者,“文革”前在文化部即是司局级干部(“文革”后任文化部代部长)。他在咸宁“五七干校”里也备受迫害。不能说周老在干校里已经觉悟很高,他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政策落实到自己身上,特别是“心系周总理”,希望周总理真正有职有权,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他“心系周总理”是对的,但在“文革”年代里指望周总理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又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只有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其后,周巍峙已经认清了干校的本质。当李城外访问他,请他谈咸宁干校那一段生活时,他发问道:“你们现在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出发点是什么?是宣传向阳湖,还是揭露‘四人帮’?”李城外回答:“为的是‘铭记历史,弘扬文化’,在宣传文化人的同时,警醒大家吸取文革惨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周老才表示首肯,谈开了往事。(见《春风曾度向阳湖——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类似周巍峙文化心态的同志也不少。他们在干校认真劳动,认真检讨,“心系周总理”,等待党的政策在自己身上落实。

其五,也有极少数一部分同志,他们在干校“解放”较早,干的劳动较轻微,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沉闷、缺少安全感的北京,来到咸宁,顿觉天地开阔,因此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篇。这可以臧克家为代表。臧老在民主革命中和“文革”前十七年写过不少优秀诗作,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又不是当权派,所以较早就“解放”了。在干校里,他基本上是干些看菜地的轻活,所以他在返京后写下的“忆向阳”诗篇,田园诗的风味十足,和干校实际上的严酷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臧老本人而言,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但就揭示干校的实质来说,他这些诗是反真实的,干校怎么可

能是诗中所描写的那么美好的田园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臧老的文化心态对某些问题不大,劳动负担不重的干校学员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臧老的夫人郑曼同志对《忆向阳》这本诗集作了解释:“当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有那么多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九十依然忆向阳——老诗翁臧克家访问记》)因此,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干校里的成员,具有如上不同的文化心态,持前两种文化心态的都是少数,而大多数持的是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文化心态,所以干校才办得下去。若不是林彪摔死,“五七”干校很可能要办到“四人帮”垮台才会结束。这就引申出这样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五七”干校能在中国出现,并持续有数年之久,这在我国的国民性方面是否也有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

三、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五七干校”何以能够存在的原因

“五七干校”以至“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办起来、发动得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农民意识的深入人心;专制主义的传统长达两三千年。这些,不光是这些,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在欧美现代国家,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即使在苏联,斯大林可以搞“肃反扩大化”,但也搞不起来“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苏联,还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在布尔什维克多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列宁的发言常被反对声打断,有人大叫:“我不同意!”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是不曾有过的。至于“五七干校”之所以能在中国办起来,而且只能在中国办起来,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环境的外部原因外,还可以而且必须在国民性的负面上找深层原因。

所谓“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国民性格。一国的国民性,既有正面、光明面,也有负面、阴暗面。鲁迅研究中国的国民性,而且为改造国民性的负面,在创作中的杂文里进行了毕生的斗争。鲁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性中,正面、光明面是主要的。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

“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等,便是中国国民性的正面、光明面。中国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始终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就因为有些优质国民性在,有“中国的脊梁”在。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又毫不含糊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如阿Q主义、“做稳了奴隶”便不思反抗,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事大主义;官本位;文牍主义;等等。这是鲁迅遗产中最有光彩、最有社会价值的部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性”这个词消失了,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不允许谈了,甚至在《辞源》、《辞海》等辞典里撤销了“国民性”这个词条。似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民性的负面、阴暗面便一下子消失了。如此忽视了与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作斗争,也就必然导致其的恶性发展,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国民性的负面、阴暗面的大发作、大展览。具体到干校,干校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同志仍然充当“中国的脊梁”,坚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者外,多数同志却暴露了、发展了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1. “天皇神明”。在封建社会里,不只是对那些“明主”、“好皇帝”,欢呼“天皇神明”,就是对那些平庸的皇帝、昏君也仍然高呼“天皇神明”,从来不敢或绝少有人敢于“逆鳞”,批评君皇。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有大功劳。但是新中国成立,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结果,是共产党成立以后经过曲折的发展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的结果,是亿万中国人民经过了“大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英勇斗争的结果,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毛泽东自己也反对把功劳集中到他一个人头上)。然而,“天皇神明”的国民性,却导致“个人崇拜”越来越发展,以至对毛泽东说的一切,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容不得半点怀疑,更不容许有任何异议。“五七指示”肯定总后勤部的某些做法是正确的,但不等于这些做法,适用于全军、适用于全党、全国、全体工人、农民、各行各业、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那时去干校的同志(我自己也一样)却以为毛主席说的是绝对正确而坚信不疑,欢欢喜喜地去干校。这不是“天皇神明”的国民性是什么?

2. “臣罪当诛”。即认为干部、知识分子的灵魂生来是肮脏的,必须“灵魂深处闹革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这一点又与坚信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绝对正确有联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他“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此前,毛泽东于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一信中说:“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从此,知识分子灵魂肮脏、农民革命性强的观念就被奉为圭臬。其实,中国知识分子虽有弱点,但其优点是主要的;农民革命性强,但也有不少弱点。两者应当互补,而不是知识分子统统不如农民,向农民学习一切。但一半“臣罪当诛”的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灵魂肮脏的观念相结合,便成了新的“原罪”意识。当时,的确有不少干部与知识分子是带着“原罪”意识到“五七”干校去改造的。在此情况下,郭小川写诗歌颂“五七道路”并不奇怪。

3. 等待恩赐的国民性。在我国,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文革”前,一听说搞“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了,“文革”后,一听说讲“三宽”(宽容、宽松、宽厚)了,“文革”期间,一听说要落实党的某项政策了,就奔走相告,高兴得不得了。但如果听意识形态领域要收紧,又害怕得不得了,唯恐大祸临头。1980年,冯牧同志在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说:假如罗斯福、里根把爱因斯坦、基辛格找到白宫,对他俩说,以后对你们知识分子实行“三不主义”了,“三宽”了,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那么爱因斯坦和基辛格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他们一定会以为罗斯福、里根得了精神病。谁要你实行“三不主义”呢?谁要你的“三宽”呢?谁要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呢?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是谁也不能侵犯的。但在“五七干校”里,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心等待的却是“恩赐”。周巍峙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

4. “窝里斗”。中国人喜好“窝里斗”,又是国民性的一大负面和阴暗面。有人说,在国外,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斗,中国人胜。两个中国人与两个日本人斗,胜负参半;而三个中国人与三个日本人斗,中国人就败了。为什么,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时,就开始“窝里斗”了;而三个日本人在一起,在国外,他们便消除私怨,团结起来对付中国人。这种说法,并不是全是笑话,而是反映了部分实情。在干校里,为什么“斗批改”搞得起来,为什么抓“五一六”抓得起来,因为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存在有“窝里斗”的国民性。只要我今天还是“革命群众”,

我就斗你这个“走资派”；只要我今天还是革命路线的执行人，我就参加揪你这个“五一六”。所以斗争会上口号声一片，斗“走资派”时一个个上台发言；在揪“五一六”的小组、大组会上，人们更是一个个认真分析，对你发动心理攻势，因为我还是“革命群众”，还是革命路线的执行人。及至后来，“造反派”也挨斗了，“革命群众”也成了“五一六”了，方才觉悟自己的可悲可笑。但在自己挨批、挨斗前，还是批斗别人不误。

自然，光是国民性存在有负面、阴暗面，还不足以办成“五七干校”，还不足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办得成，“文化大革命”发动得起来，还和知识分子的失去“自由职业”身有关。本来，知识分子全都是自由职业者。我父亲只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填表时，“出身”这一栏仍填为“自由职业”。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先是把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员接过来，成为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这些人丧失了“自由职业”身。以后高校调整，所有高校，不管是私立的高校，教会办的高校，我们接管的高校，全体教职员都成了干部，他们又失去了“自由职业”身。接着，所有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也从“自由职业”变成了国家干部。再往后，所有公私立医院、门诊部、个体医生，也都成为国家干部，那里的医务人员失去了“自由职业”身。“大跃进”期间，所有地方戏剧团以至在南京夫子庙说相声的，也都成了国家干部……。总之，在“文革”前，“自由职业”这一阶层已不存在了，全都成了国家干部了。既然端了国家的碗，就得听国家的管。否则，你一家老小生存都有问题。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

国家领导人一声令下，干部全都响应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你能不拥护不响应吗？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可以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大骂蒋介石。因为他那时是自由职业身，不怕蒋介石端掉饭碗。及至新中国成立，他成为国家干部和领导人，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都得靠国家工资。撇开其它原因不谈，单凭这一条，郭沫若能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吗？他在“文革”刚发动时，就宣布他过去写的一切，统统都是废纸，全都可以烧掉。凭这表态，他本人在“文革”中未遭批斗，未遭冲击，一家老小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原状（但也未能避免他的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如此，其它国家干部更无论矣。所以，文化系统6000余人全都下干校，没有一个敢反抗的。新时期到来后，一批批国家从业人员先后转化成为自由职业者，重新出现了一个新的自由职业者阶层，这是历史大进步。我以为，这是保证“文革”今后不会发生、发动了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的根本的社会前提。国民性的负面、阴暗面之所以在“文革”中恶性发展，与“自由职业”阶层在十七年间消失这一社会存在有关。

因此，李城外同志发起研究干校文化，其意义不只限于弄清楚干校文化的具体内容，而且是一件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我这篇文章，不过是“抛砖”之作，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深入研究干校文化！

后记：本文中所引文章，均见《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上下册分别于1997年12月和200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On“the Culture of Ideology—Remoulding School”

CHEN Liao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king 21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historically and expounds theoretically how “the Culture of Ideology—Remoulding School” rose and what it means, with its focus on analyzing the admitants’ fiv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Finally, it investigates, from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why and how “the School” could survive, thus answering systematically those theoretical questions which crop up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ulture”.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Ideology—Remoulding School;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national character